

JIAOSHI RENWEN DUBEN

# 教师人文读本

上

(新一版)



总主编：张民生 尹后庆 于漪

执行主编：商友敬 吴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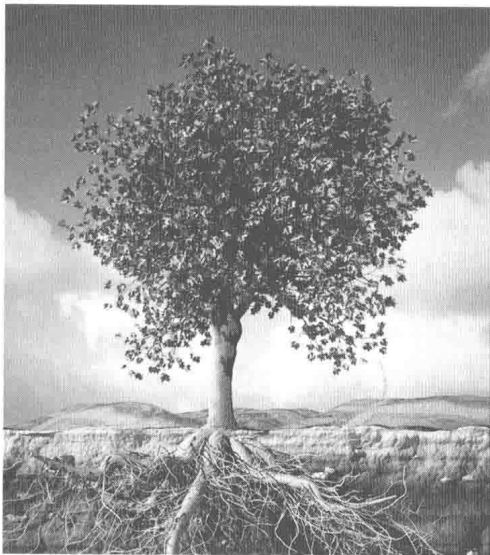
教育需要人文，学生需要人文，教师更需要人文。教师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精神不只反映着个体的社会品质，更是时代、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呼唤。因此，人文应成为教师的基本存在状态。

JIAOSHI RENWEN DUBEN

(新一版)

# 教师人文读本

上



总主编：张民生 尹后庆 于漪

执行主编：商友敬 吴国平



上海群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人文读本：新一版 / 张民生, 尹后庆, 于漪总  
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326 - 5089 - 7

I. ①教… II. ①张… ②尹… ③于… III. ①人文科学—  
—师资培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C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0987 号

---

---

---

## 教师人文读本(新一版)

(全二册)

张民生 尹后庆 于 漪 总主编

---

责任编辑 毕晓燕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1.5

字 数 744 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6 - 5089 - 7 / C · 41

定 价 78.00 元

---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59226000

# 前 言

人文精神是当代中国在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张汝伦等知识界一批中青年学者便开始了“人文精神寻思录”的讨论,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命题。这一思想随之影响到教育领域,当年的《教育参考》杂志先后多次就“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组织研讨活动,持续多年刊发了系列的人文主题的教育论作。与此同时,钱理群、王尚文、商友敬、吴非等一批秉持教育理想的学者开始了《新语文读本》的编撰工作,并于新世纪初正式出版,为广大中小学生和千万家庭提供了一套优秀的学生人文读本,该书系多次修订,影响广泛,至今畅销。

教育需要人文,学生需要人文,教师更需要人文。于是,教师的人文读物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为教师编写的人文读物确实不多,这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教师普遍不读书。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不读书的老师不可能成为好的老师,也不可能发展人文品质和人文精神。可以说,教师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精神不仅反映着个体的社会品质,更是时代、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呼唤。有鉴于此,我们尝试以阅读引领教师人文品质和人文精神,并于 2003 年组织编撰了本书。十余年来《教师人文读本》几经修订,颇受读者,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欢迎。

所谓“人文”,乃人之为人的文化状况,其核心是社会化的人。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自出生时人便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因此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个体得以参与人类共同的生活,分享并发展人类的文明,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所以,柏拉图曾经说,国家不是由石块或木料做成的,而是由公民的品性做成的。同样地,社会也不是通过强行实施一个改革计划就能改进的,而

是通过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改善而得到改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才会指出：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暴政的原则是恐怖，而共和国的原则便是教育。

所谓改善人，意味着个体的理性、道德和精神等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我们认为，脱离人文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因此，陶行知提出：“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统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有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今天，在一个创造力和知识发挥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的世界上，教育权不仅是个人参与世界生活的权利，也是国家和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显然，这一切离不开人文教育与教师的人文情怀，因此，人文应成为教师的基本存在状态。

教师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可以从阅读开始。在一个躁动的世界里，捧起一册带着墨香的书，静心阅读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奢侈的事。诚然，阅读在今天几乎无法带给我们任何世俗的功利，不读书却在世上行走、招摇过市者目不胜收。不读书，有何见不得人？每天，我们见到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行色匆匆。为什么熟悉又陌生呢？宋人黄山谷给出了答案：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原来如此。教书的人不读书，人文还有希望吗？教育还有希望吗？什么还有希望呢？

说到希望，有人质疑：人文在今天真的有用吗？人文的作用非世俗所判。并且我们以为，能给老师们提供一点人文读物固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要让老师们有读它们的心情，这才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

著名教育专家张民生、尹后庆不仅挂名本书主编，并且给予了很多指导意见；于漪老师更是身体力行，荐目写读后感，内容精彩纷呈；特级教师陈小英、余党绪、谭轶斌等一众志同道合的优秀老师积极参与编撰，感佩之至；教育学家陈桂生、著名作家王安忆、知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华东师范大学张奠宙、华中理工大学杨叔子、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已故教育界前

辈刘衍文先生、张勃之先生,以及魏国良、李镇西、程红兵等众多中小学特级教师推荐了许多选目,盛情可感,特此铭记致谢!本书执行主编商友敬先生为本书做出了奠基性工作,不幸早逝,令人扼腕,再次出版当是对友敬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最后,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王圣良主任对新一版修订付出的心血。

编者

# 我的教师梦(代序)

钱理群

我在北大 2002 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来。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些时候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1956 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1956 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 60 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

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自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一个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渡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

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地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地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

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地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最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

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地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

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地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只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节课成功

了,更意味着中学生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人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限,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

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 目 录

- 1 前言
- 1 钱理群 我的教师梦(代序)

## 上编 “人”的存在

### ■ 第一单元 生命的意义

- 3 罗 素 我为什么而活着
- 5 沉 河 生命
- 11 纪伯伦 在寺院门口
- 15 屠格涅夫 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
- 17 史铁生 拷问我的灵魂
- 29 高尔基 人
- 36 罗家伦 生命的意义
- 41 苏霍姆林斯基 给女儿的信
- 45 鲁 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54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 ■ 第二单元 科学和艺术的启迪

- 61 沈致远 科学是美丽的
- 66 汤因比 自然的奥秘
- 71 梁从诫 与自然为友：一种现代公民意识
- 84 刘巨德 心通天宇的艺术与科学
- 89 布鲁诺 真理面前半步也不后退

- 91 宗白华 美从何处寻  
98 林语堂 人生的乐趣  
104 王安忆 中国音乐在中国  
110 陈从周 说园  
117 熊秉明 从米格朗基罗到罗丹

### ■ 第三单元 理想的灯塔

- 125 司马迁 报任安书  
136 陶渊明 《形影神》诗和《自祭文》  
141 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  
145 联合国大会 世界人权宣言  
150 罗斯福 论四大自由  
152 钱满素 林肯的恶梦  
157 伏尔泰 平等  
161 冯友兰 人生的境界  
168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安居  
171 朱光潜 “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的艺术化

### ■ 第四单元 思想的诞生

- 179 爱因斯坦 我的世界观  
183 蔡翔 底层  
192 王晓明 后一种可能  
200 苏格拉底 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讲  
204 龙应台 当权力在手  
210 王小波 思维的乐趣  
217 资中筠 爱国的坐标  
226 陈独秀 偶像破坏论  
229 陶菲格·阿基姆 思想的诞生  
233 村上春树 永远站在鸡蛋的一侧

## ■ 第五单元 夫子的身影

- 239 许渊冲 名师
- 246 启 功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怀念陈垣先生
- 259 梁文道 老校长
- 263 傅斯年 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
- 267 季羨林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276 金克木 化尘残影
- 282 钱理群 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
- 286 唐德刚 教我做 research 的启蒙师
- 291 王 蒙 橘黄色的梦

## 下编 “文”的使命

### ■ 第一单元 经典的再谈

- 297 编 者 国学经典导读
- 299 朱自清 “四书”与朱子
- 303 李长之 孔子的故事(节选)
- 311 孔 子 论语(节选)
- 322 李泽厚 论孟子
- 330 金克木 读《大学》
- 339 《礼记》 大学
- 344 邵汉明 论《中庸》
- 347 《礼记》 中庸(节选)
- 351 闻一多 庄子
- 362 《左传》 和而不同(二则)
- 364 《老子》 道德经(节选)

### ■ 第二单元 阅读的品质

- 369 陈四益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
- 373 龙应台 百年思考